

# 农村教育城镇化：动因、目标及策略探讨<sup>\*</sup>

胡俊生

**【摘要】** 城市化要经历土地、劳动力和家庭城市化几个阶段，受城市拉力乡村推力双重作用影响，农村教育城镇化已成大势所趋；农村教育的希望不在乡下在城镇；当下目标，是率先推进农村初中县城化，“平原模式”具有示范借鉴意义；当下任务，是要调整新农村建设政策思路，使其建设目标与城市化发展战略相吻合。

**【关键词】** 教育移民； 农村初中县城化；“平原模式”

**【作者简介】** 胡俊生，陕西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生，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安710062）

“农村教育城镇化”意为何指？缘何而起？是否已成大势？它与“城市化”进程有何关系？与“新农村建设”目标指向是否相悖？选择怎样的路径才较为切实可行？到底应当怎样评价它对统筹城乡教育资源、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

## 一、农村教育城镇化：城市化的题中之意

我们之所以把农村教育问题放在城市化的理论视域中进行考察，是因为，骤然涌来的城市化浪潮，把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农村发展要素与城市要素裹挟在了一起，要想摆脱城市化提速的大背景而孤立谈论农村教育发展问题，不仅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徒劳无益的。

**（一）城市化的实质是村民进城。**城市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的“量化”过程及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同化”过程的有机统一。<sup>[1]</sup>这里的要素既包括物质要素，也包括精神要素。城市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即是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

---

<sup>\*</sup>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规划课题（项目编号：09H004），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08JK191）阶段性研究成果。

重下降。“城市化的实质，是消化城乡差别，实现社会转型。”<sup>[2]</sup>樊纲先生则更直白地指出：城市化的本质是把原本不属于城市的东西“化”过来，是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工业服务业劳动者的过程，是土地用途的转移过程，更是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简单地说，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城市扩大、市容量更新、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叫做城市发展，而不是城市化。<sup>[3]</sup>我国的城市化处于加速时期。解放初，我国人口的90%都在农村。到1978年城镇人口比例仍不足18%，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不足0.3%。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至2008年末，城镇人口首次突破6亿，城市化水平达45.68%，年均递增接近1%。<sup>[4]</sup>其中还不包括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使我国进入了人口流动迁移的活跃期。据有关统计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从1982年667万上升到2005年的1.47亿，20年增长21倍！国家人口计生委推算，2008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01亿。在未来30年，我国还将有3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将形成城镇人口、流动迁移人口、农村人口各5亿的“三分天下”格局。<sup>[5]</sup>

**（二）农民工进城不等于农村家庭进城。**我国人口流动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劳动力进城，非劳动力留村；父（或母）进城务工，子女留村读书。笔者把这种只有部分（1/3、2/3或者1/2）家庭成员流动迁移的现象称为“离散式转移”。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引发的社会后果，便是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的出现。这部分孩子因亲情缺失，教育缺位而患上“留守综合征”。全国妇联于2008年2月27日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全国0-17周岁留守儿童占全体儿童的比例为21.72%，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的比例达28.29%，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这种“离散式转移”或人口的“半城市化”状态，潜藏的问题甚多，但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尤为不利。

**（三）中国人口转移“三步曲”：土地-劳动力-家庭。**从人口流动迁

移角度看，近 30 年来，中国城市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过程，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三步曲”：一是土地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设市城市个数由 1978 年的 193 座增加到 2008 年的 655 座。过去 10 年全国各类建设用地高峰期每年达几百万亩，占用的都是优质耕地。比如北京，本世纪以来每年城市用地要消耗 60 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澳门的面积。<sup>[6]</sup>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圈地运动”就象“摊大饼”，一圈一圈向外摊。其中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是，把土地“摊”走，把人给留下，出现了普遍的人地分离情况。而且用低价“摊”走的土地修的房叫“商品房”，可以堂而皇之高价出售；农民用自有土地修造的房叫“小产权房”，不能上市交易。“城中村”景观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城市化特定阶段“只要土地不要人”的事实。二是劳动力城市化。如前所述，流入城市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由称呼即可知他们的成分构成十之八九是年轻体壮的男女劳动力。农民工举家迁移，或称“复数迁移”所占比重较小。根据李强先生对四川重庆地区外出农民工年龄状况调查，35 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 88%，他的结论是，“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sup>[7]</sup>而这种没有家庭全体成员参与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口迁移，既不合理，也不人道。这是农村“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主要原因，也是促成农村教育城镇化的一个潜在原因。三是家庭城市化。这是预期，还不是当下现实。但由于前两个阶段“只要土地不要人”，“不要妇孺要壮丁”的做法持续时间太长，累积的矛盾日益突出，以举家全迁为特点的“人口城市化”阶段会加速到来，农村教育城镇化作为其伴随物自然相伴而来，“民工流”之后将是“学生流”。

## 二、农村教育的希望：不在乡村在城镇

提出这个观点也许会遭到多方面的责难，但下述材料可以从理论与实践几方面支持笔者的判断：

（一）“推拉理论”。这是解释人口流动的原因与动机的最权威的也是广为人知的一个理论。观点的首倡者巴格内研究认为，人口迁移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这样，流入地的那些使移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因

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的发生就是因为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两种强力造成的。乔治（P. George）则进一步提出，引起流动的力量从主观上看可以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情况。所谓主动的是因需求所引起，例如对于高收入的追求；所谓被动的是由环境条件所引起，例如在恶劣的条件下难以生存。扎波（D. F. C. appo）则认为，所谓推力不仅是指恶劣的客观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是由两种水平之间的差距造成的：一种是人们现有的生活水平，另一种是人们渴望达到的生活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越大，则人口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sup>[7]</sup>按照“推拉理论”来解释我国城市化中的人口流动现象——无论是规模庞大的民工流，还是暗流涌动的学生流，都是有说服力的。事实上，农村学生向城镇流动，正是基于对城镇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及对农村教育现状的不满前景的失望。农村孩子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首要的是必须走出村寨进入城镇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去跨越中考、高考这两道门槛。高中日益成为最难跨越的硬槛，成为农村孩子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最大瓶颈。事实上，高考的城乡差距，早在初中阶段就拉开了。200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4030.95万人，按照毛入学率52.7%计算，应有3500多万初中生流入社会，其绝大部分是农村初中生。2008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4576.07万人，毛入学率升至74%，比例虽有明显上升，但农村学生的不利处境仍然没有改变。进入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30年降了一半，且大多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sup>[8]</sup>这与上世纪80年代的情形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局面到底是怎样造成的？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差序格局”造成的；乡村不如县城，县城不如省城。学生就读学校的区位结构决定了他的未来发展。据华南师大张敏强先生推算，把多年来给广州一所省重点高中和一所县城高中的投入平均分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你就会发现可能是数十万元和几千元的对比。”<sup>[8]</sup>这里讲的是高中教育的梯度差序格局。假使以一偏远落后的乡村初中再和县城特别是省城重点初中比，因为相差过分悬殊，几乎失去了比较的意义。问题的核心在于，初中教育最先

也往往是最终拉开了城乡学生的差距。这是农村学生向往到城镇读书的最强劲的动力。

(二)“离土不离乡”的乌托邦。“离土不离乡”曾以发展乡镇工业小城镇为主要内涵的“苏南模式”而红极一时，广受追捧。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对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作了以下诠释：城市所需要的劳动力可以流动，但非劳动力不可以流动；人可以流动，户口不能流动。结果，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外出打工进入城市，只能将自己的户口和家人留在老家，以“流动人员”的身份漂浮在城市。这种人为制造的人户分离带来两个严重的社会隐患：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漂浮族给社会带来的治安隐患，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带来教育隐患。即以前者论，因为它有悖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及我国现代化的长远利益，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即以后者论，乡校的衰败与城校的繁荣是同时并存的。无论我们在乡村学校建设上下多大力气投多大成本，终究是“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基础教育上的“离村不离乡”、“进乡（镇）不进城”设计没有前途。教育城镇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成为民众的自发行为和普遍诉求。要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这样一组矛盾现象：农村中学十几名教师教几十个学生，处处衰象无以言表；城市中学则学生爆棚，“超大班”成了治不了的顽症，需要动用政府的力量强行减肥消肿。安徽临泉一中学，不足60平米的教室摆了12排桌椅，排了136名学生，最多则超过140人！<sup>[9]</sup>事实上，不仅中学如此，许多县城小学也成了“巨无霸”，却仍然供不应求。流动儿童“借读生”和农村高年级学生转学生是县城小学急剧膨胀的主要原因。<sup>[10]</sup>

笔者以为，乡村教育的萧条，如同乡土社会的衰落一样，顺乎时势，不可逆转，它迫使乡村学生及其家长做出“背井离乡”走入城镇的选择。世界城市化进程曾表现出一个规律性特征，即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衰落几乎是相伴而生，并形成此消彼长的循环态势：城市越是繁荣——流入城市的人口就越多——乡村越是萧条。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而“城郊化”、“逆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暂时还不会到来。

正因为基础教育的优质资源大都集中在了城市，“教育移民”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或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一种模式。

**（三）乡村教育的困境。**刘铁芳先生有感于乡村教育的衰落，撰文呼吁“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他认为，积极有效地促进乡村少年的精神成人，促进他们置身乡村社会之中，健康、活泼、全面、自由地发展，启迪、发育他们的健全人格，即是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乡村教育包括形式、文化、本体三个层面。过去我们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大都停留在第一个局面，即基本国民教育的保障，实际上后一层目标才是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即“怎样使作为乡村少年基本生存场域的乡村进入乡村少年的精神建构”，使其成为了乡村少年发展的“精神场域”，培养其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等等。<sup>〔1〕</sup>愚以为，刘先生的设计好则好矣，美则美矣，然操作实现的难度可谓大矣：这是因为，城市化潮流如大浪淘沙，奔涌而至，它把乡下的精英裹挟而去，老、少、妇（所谓“996138部队”）成为乡村人口的主体。人气不旺，活力不存，往日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美景不再。要想培育村童对故土的情感热恋，难；他们也许更热切地期盼早早离开乡村和在城市打工的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到城市学校，看看电脑互联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此其一；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使得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主导社会文明，城市价值成为主流价值。乡村少年即使足不出村，与城市隔绝，但他能坚守住自己的起居窝棚，坚守不住他的所谓“精神场域”。今日之乡村，虽发展迟缓步履蹒跚，但早已被城市的浑水浸染了一遍又一遍，甚而至于它的空气与水。生存场域肢解，精神场域异变。在此背景下，试图以一厢情愿的朴素乡土情感实现对乡村价值观念的坚守，已是十分困难。斯本格勒说，“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此论虽未免言之太过，但我们对城市文明的巨大冲击力、破坏力，显然不可低估。此其二；乡村文化领地的退劫失守，是与城市文明的强势渗入及乡村精英的大量外流同步的，或者说，后两者与前者形成某种因果关系。由于精英外流，乡村文化出现了传承链断裂和文化领

地的毁坏。在业已支离破碎的乡村家园，通过同样支离破碎的乡村学校和心猿意马、人在乡下心在城的乡村教师来守护、传承、弘扬、捍卫“乡村生活价值理念”，完成“乡村少年的精神构建”、继而“开启树立乡村少年量身乡土社会基本的生存自信”，恐怕是力不从心，强人所难。此其三。上述诸条，共同促成乡村教育的困窘和乡土文化根基的动摇。对农村孩子而言，无奈而又明智的选择也许只有一条：到城里去，找寻他们迷茫的希望与失落的理想。城市化潮流恰好给他们搭建了一条离乡进城的通道。

### 三、当下目标：农村初中县城化

农村教育城镇化，是笔者自行设定的一个概念，大致意思是：基于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教育质量低下，教师流失严重等实际，拟将农村教育的主阵地由乡村逐步转移至办学条件相对优越的城镇地区，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藉离乡进城之手段，达到城乡教育均衡化之目的，为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及城乡一体化创造条件。本文特指农村中学教育县城化，并以为这就是当下农村教育城镇化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

**（一）操作思路。**怎样使农村中学教育县城化的目标指向变为现实行动？笔者的设想是：初中进城，小学进镇，集中修建一县教育园区，把县城所在城镇逐步变为一县基础教育的主阵地，从而实现由乡村化→县城化→城市化的战略转移。

首先，是逐步把农村初中全部撤销，学生全部转入县城中学就读。中学师资全县整合，统一调配；学生则打破原有属地界限，实行城乡混合分校、编班，实现县域内初等教育的城乡无差别化，学生身份平等化，农村教师城镇化。目前的高中教育，早已先行一步集中到了县城办学，无需再议；小学教育，受办学条件、地理环境条件及小学生年龄等种种条件限制，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只能维持乡下学生乡下读的格局不变。但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强调：一是在合理布点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办好乡（镇）寄宿制中心小学，在教学设备、师资配备、课程开设及文娛场馆建设诸方面尽量缩小与县城小学的差距，为农村小学生提供尽可能

理想的学习成长环境，同时缓减小学生进城所带来的种种压力。二是鉴于农村人口转移模式已由单纯的“进城务工经商”向“进城务工经商”+“送子进城读书”转变，“教育移民”已渐成风气，“小学进镇”已不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县城小学“爆棚”现象早已露出端倪，因此，有必要为农村小学高年级学生进城求读做好相应准备。

其次，集中打造一县基础教育园区。根据一县基础教育资源的现状及对未来学生规模增减的预测，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集中投资，集中修建，为农村教育城镇化搭建好硬件平台。从长计议，园区规划应合理安排初中及高中学校的扩容数量及规模，确保乡村中学撤消后学生不仅能顺利进城有学校可去，而且新校基础设施等办学条件理应比乡村中学有显著改善。同时还应考虑职校布点及小学的增置扩容。园区投入使用后，实行师资、设备的统一调配，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逐步取缔重点校，为校际间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二）政策支持。**推进农村教育城镇化（或曰农村初中县城化），说易行难，阻力很大。必须教育界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形成普遍共识前提下，得到以下政策支持：

1、打破陈规，拆除城乡教育分治的属地、户籍樊篱，为乡下孩子进城读书扫平体制障碍。

2、广开渠道，多方筹资，扩大县城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校舍不足，是制约学生转移的瓶颈；经费不足，又是校舍建设的瓶颈。可行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把各级政府的教育拨款、社会捐资集中起来向园区建设集中使用；二是进一步放宽政策，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以分担政府办学压力。这方面还有较大的政策调整空间。薛涌先生甚至主张“复兴私塾”，为城市流动人口女子提供灵活的教育机会。他说，在美国，竟有200万学生，即适龄学生的1/25上私塾，形成了一个价值8.5亿美元的家庭教育市场。<sup>[12]</sup>这对我们亦不无启发意义。

3、为贫困生提供生活补助。孩子进城读书，家长有两个忧虑：一是安全问题，一是经济负担问题。前者靠学校管理，后者有赖政府的帮扶。

国家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政策，已经大大减轻了贫困家庭的经济压力，但由乡入城后住寄宿制学校所产生的生活费用成本肯定是提高了。办法有三：一补：政府筹资直接给予贫困生以生活补助；二奖：对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予以奖励，奖金额足以维持一个时段（如一个学期）的生活费用；三调：即调整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措施，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予以教育重奖。据了解，除了自然条件极差，农民收入特低的贫困山区外，大多数农民只要遵纪守法不曾超生，那么供孩子去县城完成义务教育学业不应有太大困难。真正无力供孩子上中学以至上大学者，往往是超生大户。笔者的想法是，要使计生政策与助学帮困政策互相衔接，不能让少数人违规超生，众多遵规守纪的纳税者为其超生致贫买单！

[13]

4、修建“助学廉租房”，开辟“教育三产”市场，为陪读族解困分忧。应当承认，时下城市住房条件最差、最需要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人群，是流入城市的乡下人：打工族和陪读族。中心城市的“学区房”（重点校、名校周边的房屋）价格飚升，受到热捧，是由择校热所引起，富裕家庭居多，有“愿打愿挨”的成分。其实，县城里的“学区房”，或租或买，亦价格不菲，且远远供不应求。我国的城市化以土地城市化速度最快，但曾经的土地主人农民从中获益最少，即使他们失去了土地已经进入了城市，但他们的住房问题并没有真正纳入政府议程。建议政府比照城市“经济适用房”的办法，筹措专项经费，以更优惠的价格条件专门针对入城农民群体修建廉价适用的廉租房，可称为“新市民廉租房”，让“打工族”和“陪读族”有房租，租得起房，以逐步“告别不人道的工棚制度”，缓减学区高房租带来的生活压力。“教育园区”覆盖或辐射地区，开辟服务于教育的三产市场，尽可能为入城陪读家庭创造就业机会。

5、适当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确保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发展战略彼此衔接并行不悖。新农村建设的大方向没有错，但思路和方法要调整。传统的农村居民点过于分散，依村建村成本太高很不划算。要合

理规划，适当撤并，设置村民中心居住区或专业农民居住点。对于那些人口外流严重，村庄迅速衰落，自然条件恶劣，居住过于分散的村庄，应下决心实行移民搬迁，让村民远离贫困，向城市文明靠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以前瞻性眼光算长远发展的大帐；大的工程项目，应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效益评估。总之，一切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都应和城市化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统筹考虑。否则，非理性的激情决策，对一个已经走向衰落的村庄，住十几户几十口人，也要搞“几纵几横”实现“三通”，成本太高代价太大。建不如迁，则应以迁代建。著名学者陆学艺、党国英先生也都发表过相同的见解：新农村建好了，但人走光了；道路修得越快，农民跑得越快。这并不是说新农村不需要建设，而是要看到农村人口正在并将大量向城镇转移的事实，科学规划，整片整治，力争避免无用建设，减少钱财浪费。农村中小学的“撤点并校”，其实并非一时冲动，完全是基于农村教育的实际。但正象农村居民点需要整体规划设计一样，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以及初中教育县城化的实施，也必须依赖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这两大政策上的意志统一步调一致。政策导向上的模糊摇摆，很可能导致实际操作中巨大的目标偏离。我坚持认为，农村教育的文章要在城镇做，农村教育经费要往城镇花，农村教育的主阵地要往城镇挪，农村教育的希望在城镇。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理所当然地也应包括对农村教育发展战略的理性调整。

**（三）可行性分析。**农村教育城镇化或迟或早或快或慢终将由理想变为现实，是基于以下判断：

第一，城市化的规律决定了教育移民规律。“城市化，说到底是一个人口要素和经济要素在一定区域范围的集聚。”（李强）人口集聚的趋向，一如赫什曼所说，“总是从边缘地区迅速地流入核心地区”，从而形成彼得森所描述的旨在“改变其生活方式”移民类型。<sup>[7]</sup>当土地、资本、劳动力的集聚达到一定程度，移民类型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即由个体移民转化为家庭整体迁移。人口流动的动力因素也将由经济因素为主逐步转

变为教育诉求、生活方式改变和家庭幸福等非经济的多元因素。唯甚如此，40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和4700万“体制性寡妇”才有望在城市与父母家人团聚，众多农村学生才有望分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及现代都市文明。高佩义研究发现，城市文明普及有阶段性加速规律：当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时（例如：20%-30%），城市文明在一定区域内加快普及，享受城市文明的人数多于城市实际人口数，城市文明覆盖的区域大于城市社区面积，即城市文明普及程度高于城市化程度。经分析，当城市化水平超过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达到70%以上，这个阶段是城市辐射力最强，城市文明普及最快的时期；当城市化水平超过7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达到90%以上，就意味着不住在城市里，照样能享受到城市文明，这时，人口和经济就不会再往城市流动了，城市引力趋近于零甚至为负。所以，城市化水平达70%时便趋于稳定，如英国城市化水平1931年已达78%，而到1959年也只有78.5%。<sup>[14]</sup>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仅为45.7%，即使再过30年，城市化率达到60%，也还不能达到人口与经济的流动“趋于稳定”的程度。因此，城市的吸引力依然强大，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愿望依然强烈，与民工流相伴而行的学生流势头依然强劲，农村教育城镇化方兴未艾，前景广阔，毋庸置疑。

第二，农村初中县城化，有助于破解农村教师外流困局，整体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农村教育落后，根本在于优秀教师缺乏。好教师留不住，大学毕业生又不愿来。城乡教育的差距，关键是师资水平的差距。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维方式，把乡下的中学挪到城里，境况就会大大改观。毕竟，县城是一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让优秀大学毕业生在县城中学任教，远比在乡下容易得多。精神生活贫乏，找对象难，是阻碍大学生下基层执教的重大心病。较而言之，县城的境况就要好得多。多样化选择的时代，我们已很难用80年代前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今天的大学生。硬着来不如顺着来。农村教育城镇化，毫无疑问是吸引人才、稳定人才、遏制人才外流的釜底抽薪之道，一定会受到现职教师和未来教师的欢迎。

第三、“平原模式”具有示范价值。我们认定农村教育城镇化具有可

行性，不止于理论上的逻辑推论，更有来自于实践的成功案例的佐证。2008年，山东省平原县农村初中全部“农转非”，农村孩子全部进城上初中。一步到位，实现了农村初中以上教育的城镇化。<sup>[15]</sup>我把平原的做法称之为“平原模式”，并认为它具有开创性意义示范性价值，值得全国各地学习借鉴。<sup>[16]</sup>事实上，全国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探索性试验。海南省从2008年开始，在8个贫困县实施“教育移民”，分步将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學生整体搬迁到县（市）城镇或人口较多的乡镇集中就学。<sup>[17]</sup>陕北的神木县、吴起县，由于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开发带动经济快速发展，或者实现了12年免费义务教育（神木），或在计划初中进城（吴起）。上述情况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地不分南北，县无论贫富，教育移民的潜流正在涌动，并且正在得到政府的助推，农村教育城镇化曙光在前，令人鼓舞！现在需要做的是深入研究，积极引导，强力推进。

---

#### 注释：

1. 朱道才, 陆林. 城市化问题的争议与诠释[J]. 学术界, 2009, (3).
2.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98.
3. 孙明泉. 城市化进程与公共政策研究[N]. 光明日报, 2009-02-17<sup>⑩</sup>.
4. 阮煜琳. 中国城市化水平 45.68%, 人口突破 6 亿[EB/OL]. 中国新闻网, 2008-04-15.
5. 吕雪莉. 中国未来 30 年城镇、农村及流动人口将各达 5 亿[EB/OL]. 新华网, 2009-04-14.
6. 张妮. 城市化政策需再次转型[N]. 中国发展观察, 2008-06-05.
7. 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18、400、369
8. 邱瑞贤, 杨明伟. 农村大学生比例 30 年降一半 机会不均等延续[N]. 广州日报, 2009-02-07.
9. 张学景. “大班额”何时才有消肿[N]. 中国教育报, 2009-02-14<sup>⑪</sup>.
10. 王宏旺等. 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八年之痛: 孤儿离乡求学[EB/OL]. 四川在线, 2009-04-01.

11. 刘铁芳. 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J]. 新华文摘, 2008(16).
12. 薛涌. 谁的大学[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97-180.
13. 胡俊生. 怎样破解助学帮困中的超生致贫难[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 (16).
14. 高佩义. 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15. 佚名. 农村孩子该不该进城上初中[N]. 中国青年报, 2008-09-28②.
16. 胡俊生, 司晓宏. 农村教育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平原模式”与“柯城模式”浅析,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9, (2).
17. 郑玮娜. 海南在 8 个贫困县实施“教育移民”[N]. 中国青年报, 2008-02-21①.

原载:《教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http://www.sociology.cass.cn)